

论恩格斯对生态观的阐述与论证方式

王 滨, 陈海瑾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创立了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全面阐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指出人与自然关系恶化会导致生态危机, 并论述了产生生态问题的认识论和社会根源。恩格斯的生态观的先进之处不仅仅在于结论的深邃和高瞻远瞩, 更在于阐述和论证生态观的手段和方式, 对我们理解和阐释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恩格斯对生态观的论证和阐述方式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 第一, 从劳动本质透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根源; 第二, 用因果分析法阐述生态危机的认识根源; 第三, 以阶级分析法阐述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 第四, 用辩证思维阐述人类改造自然的两重性; 第五, 用系统论思维阐述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

关键词: 恩格斯; 生态观; 阐释方式; 论证方式

中图分类号: A 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4)06-0546-05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20704326

Engels' Explanation and Argumentation of his Ecological View

WANG Bin, CHEN Haijin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Engels' *Dialectics of Na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m, it elaborat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at the distorted relationship will result in ecological crisis. His ecological view explains the epistemic and social causes of ecological crisis, its profundity and foresight also lies in the means and ways of argumentation, which has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Engels expounds his ecological view in five aspects. Firstly, the essence of labor mirrors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econdly, cause-and-effect is the epistemic root of ecological crisis. Thirdly, class differentiation is the social root of ecological crisis. Fourthly, dialectics can explain duality of human changing of nature. Finally, systemics expounds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words: Engels; ecological view; way of interpretation; style of argument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 1873—1882 年间撰写的由论文、札记等组成的手稿, 同时也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2024 年距离恩格斯为这部手稿落下最

后一笔过去了整整 142 年。这 142 年来, 人类对自然界以及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不断地深化, 并产生了重大变革, 但恩格斯所奠定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仍

收稿日期: 2022-07-04

基金项目: 上海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课题资助(2023ZSD003)

作者简介: 王 滨, 男, 教授。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E-mail: wangbin@tongji.edu.cn

通信作者: 陈海瑾, 女, 副教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思想政治教育。E-mail: chenbj@usst.edu.cn

然是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南。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这个世界观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式的说教,而是进一步进行研究的出发点,以及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今天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新解读恩格斯的理论遗产,我们发现,恩格斯的生态观的先进之处不仅仅在于结论的深邃和高瞻远瞩,还在于阐述和论证生态观的方法和手段上,这对我们理解和阐释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恩格斯对生态观的论证和阐述方式可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从劳动本质透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根源

在论述人与自然关系时,恩格斯并没有直接引出结论,而是先分析劳动,透过对劳动的分析引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主题,这样的论证方式看似迂回,实质却是从本质论出发的。人类如何从自然界分化?人类社会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呢?劳动正是揭开这些人类历史之谜的钥匙。劳动是人凭借知识和工具以自身活动来引发、整合和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劳动是人类社会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劳动恰恰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根基所在。劳动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劳动决定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建立,进而也决定着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进步。

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达尔文从生物学方面阐述了人类起源的问题,他由此得出“人是由古猿进化而来的”的科学结论。然而,从猿到人的转化仅仅是一个纯粹生物进化过程吗?达尔文并没有阐述,事实上从猿到人的进化更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而劳动正是这个社会化过程的内在机制,以及历史和现实的基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阐述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一系列关键环节和作用,比如劳动促进手足的分工、直立行走、手功能的进化、语言的产生、大脑的发达、交往出现等。所以,恩格斯强调了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而且还是劳动的产物。恩格斯分析了人手、发音器官的进化,提出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所以人就有了更优越的劳动能力,

从而进行越来越复杂的劳动,人也就能提出更高的目的和取得愈来愈高的成果,从而产生了“人的两次提升”。

正是从这种对劳动本质的认识出发,恩格斯阐述了人与自然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并符合逻辑地引申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状况,指出可能产生冲突和协调的问题。恩格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1]551}

二、用因果分析法阐述生态危机的认识根源

因果分析法是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利用事物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来进行解释、推理和预测。该方法着重于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和结果以及相互联系,以此为依据,通过原因结果分析来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和联系,并通过分析找出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2]121}。恩格斯论述生态观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从人类对自身行为后果的预测性上,阐释人类生态危机的表现以及认识论根源。恩格斯认为,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人们认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人们越来越接近自然的真相,会正确地认识和掌控自然规律,从而进行准确的预测,进而预测人类改造自然行为引起的后果。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后果不仅仅是近期的自然后果,人们还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在论证中,恩格斯既肯定了人的认识能力,同时也指出了人认识的局限性,尤其是对一种行为较远的后果常常缺乏预测能力^{[3]124}。而生态问题或者说生态危机,恰恰是人类行为产生的较远的后果。恩格斯将人类行为后果分为短期后果和长期后果,直接后果和间接后果,并指出,人们预见长期后果要比预测短期后果困难得多,预测间接后果也比预测直接后果更困难,预测社会后果比预测自然后果更困难。

恩格斯接着又采取分析方法,将人类对自身行为后果分为对自然的后果和对社会的后果,并阐述了一个至今看来都是极其经典的原理,那就是:人类对自身行为的社会后果的预测是很难做到的,人类对自身行为的社会后果的预测,尤其对远期社会

后果的预测,要比对近期自然后果或远期自然后果的预测难上加难。恩格斯指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和社会,人们注意的往往只是最初的最显著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会发现,取得上述成果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后果,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后果甚至是与最初预测完全相反的。

为论证这一观点,恩格斯列举了几个典型事例。其中之一是有关爱尔兰种植马铃薯以及随之而来的瘰癧症的蔓延。马铃薯最早起源于美洲的印加帝国,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被那些探险者们带入欧洲。欧洲贵族们一开始只是通过种植马铃薯来欣赏它结出的花朵,而并没有将其视为食物。1740年冬天,欧洲寒潮影响小麦减产,马铃薯便被作为粮食作物才在欧洲推广。按理说,马铃薯的出现为欧洲大陆带来了人口增长的粮食基础,可是马铃薯竟导致近100万爱尔兰人死于饥荒,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没有预测到这样的后果。要知道,美洲原住民在种植马铃薯的时候,常常会把两种不同品种的马铃薯放在一起耕种。这样一来,一旦遇到一些病害或虫害,马铃薯便会因品种的不同而减少相互间的传染。但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并未传入爱尔兰,爱尔兰人并不知道这种做法,他们只依赖品种单一的马铃薯的供给而生产和生存。1845年的夏天,一种能引发马铃薯疫病的真菌进入了爱尔兰。由于当时爱尔兰的农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年又将更多的种子投放在已经遍布着病毒的田地里。这个做法引发出一个更为严重的致命的后果。1846年的夏天,残留在田野里的病株在温暖湿润的条件下再次爆发,摧毁了整个爱尔兰的马铃薯田。幸存下来的活体马铃薯根本无法满足800多万爱尔兰人的粮食需求,导致差不多饿死了100万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并且迫使大约200万人逃亡海外。

恩格斯还列举了其他因果关系事例,比如,18世纪制造出蒸汽机的人们面对这一新生事物当时根本无法料到,蒸汽机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发生革命。随着以蒸汽机为主导技术的大机器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结果却产生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结果,而这一切就必将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结局只能是资产阶级垮台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

那么,人类是否有能力认识其行为的长期社会后果呢?恩格斯给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他说:“我们也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

历史材料的比较分析,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在社会方面的间接的、较远的影响,因而有可能也控制和调节这种影响。”^{[1]562}恩格斯的上述论证有着极清晰的逻辑,那就是,因为人们对自己行为的长期后果缺乏认识,尤其是不能预测长期的社会后果,而生态环境问题呈现的是人类行为的长期后果,因此人们对伴随着改造自然的过程可能产生的生态危机缺乏预测。而生态危机不仅仅造成自然环境的恶化,也造成人类社会矛盾,从而产生人类生存危机。由于人们逐渐具备了预见到自己行为的长远的社会后果的能力,从而能够根据这些认识来规范和改变自己的行为,引导自己的行为向着减少破坏环境、促进生态文明的道路发展。

三、以阶级分析法阐述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

阶级分析方法是认识阶级社会的基本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阶级的理论论述在其《共产党宣言》中表述得最为清晰,他们提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4]32}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利用阶级分析方法来阐述其生态观。他提出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是有阶级基础的”这一命题,以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出路——消灭私有制。恩格斯指出,生态问题仅仅靠提高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对人的行动后果的认识是不够的,必须从分析资本主义入手,从解决阶级矛盾入手,因为生态问题的社会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5]21}。

1844年到1845年间,恩格斯完成了著名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的写作。在这本书中,恩格斯详细描述了英国在其工业化早期出现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揭示了工人阶级生存环境的恶劣现实。19世纪初正是英国的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无论对早期的英国和当时整个世界来说,工业化都是一个新生事物,人们很少关注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会给人类带来生态危机。而恩格斯在当时就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他指出这个问题并分析了造成英国早期城市生态问题的根源。

恩格斯认为,英国是通过水力、分工和机器使用这三大手段进行工业化的,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使

英国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形态变迁,但同时它也开启了对自然生态和人自身的极端损害和破坏的进程。资本家唯有极度膨胀的物质欲望和无限享乐的追求,没有新鲜空气、清澈河流与美丽城市的概念。恩格斯说:“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过高的死亡率,除了不断发生的流行病,除了工人的体质越来越衰弱,还能指望什么呢?”^[1]恩格斯还说:“……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4]346}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进一步提出,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他举例说:“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赢利的咖啡树利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1]470}

四、用辩证思维阐述人类改造自然的两重性

在阐述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危害时,恩格斯还利用了辩证法最基本的原理,这也是恩格斯在论证中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在恩格斯那个时代,辩证法或者说辩证思维根本还不是社会大众的主流思维方式,即使是当时的科学家也大部分受形而上学思维的支配,而要使人们认识到人改造自然的两重性,只有通过辩证法才行。

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恩格斯用了大量篇幅阐释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揭示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辩证本质和辩证法的普遍性。恩格斯用“对立面的相互渗透”这一命题来概括辩证法,即对立面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性质,称为同一性;对立面之间具有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性质,称为斗争性。矛盾双方既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发展。恩格斯在论证中还形象地用“胜利”和“失败”、“破坏”与“报复”等几对辩证范畴来阐述人们应该如何认识自身的行为。

“胜利”也可能意味着失败,“自信”的极端就可能是自大。这样,恩格斯留下了一句至今不断被引

用的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559}

为证明这一观点,恩格斯列举了世界曾经的发达地区出现的生态问题。比如,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人们,他们为了得到耕地,就毁灭了大量森林,但是他们却想不到这样做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呢?今天,这些地方竟成为不毛之地;同样,住在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把那些在山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他们当时也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同时在雨季到来时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从而引发出一系列的生态灾害。

恩格斯具有极超前的洞察力。在近代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破坏自然和自然报复人类的效果,常常是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才能显现出来,因此这样的因果联系并不容易被认识到,也更不容易被看到由于人们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而得到的报复。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发生的几起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20世纪末以来自然界发生的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等生态失衡现象,何尝不是肇始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对自我胜利的陶醉呢^{[6]98!}

当然,恩格斯也通过辩证法证明,“坏的结果”也可以转化成好的方面。恩格斯在1893年10月10日给俄国友人尼·丹尼尔逊的复信中说了一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一辩证思维,从一定意义上认证了人类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不正是因为人们不断遇到生态环境问题才警示出来的吗!事实上,“世界地球日”和“世界环境日”的确立都与当时人们面临世界范围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关^{[7]34}。

辩证思维今天仍然是我们认识生态文明的方法论。今天世界上一些地区仍面临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反省也在不断深化,就制度变革而言,我们需要扬弃以私有制为根基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就人与自然关系而言,迫切要求人们摒弃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抛弃人类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自豪感,这是一种虚幻的自豪和自信,需要我们回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中来。在超越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的今天,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可以统筹兼顾、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

思想站在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和规律,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命题为核心的“两山理论”,以辩证思维回答了这个时代之问:我们要经济还是要环境,要增长还是要生态?这个在我们以往的发展追求中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只能是二选一的难题,有了新的答案,我们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有了突破性的认识,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践充分证明,保护生态本身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认识上的,更需要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最终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五、以系统论思维阐述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

人与自然是自然辩证法的中心线索。对此,恩格斯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即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恩格斯运用联系的观点和系统论的观点,指出了形而上学自然观产生的原因,并预言人们会逐渐接受辩证的自然观。普遍联系的观点还进一步提示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这两者是无法分割的。今天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更需要通过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才能解决,这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伦理关系、法治关系等。

人与自然不仅仅是普遍联系,同时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是人与自然的一体性。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维内容,恩格斯在当时虽然没有提出和利用系统这一概念,但处处表达了系统思想。恩格斯说“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体系实际上就是系统这个概念的一种通俗表达。恩格斯从人与自然构成体系这一思想出发,阐述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人作用于自然,影响自然,自然也同样会以某种方式作用于人,并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人类不可能独立于自然界之外,也不可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不应该以主人的姿态,任意去改造自然,而是要尊重自然,与自然

保持和谐。

人与自然界一体性思想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正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与发展。这一思想揭示了今天的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相互联系那样简单,而是构成了具有生命意义上的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指互相依存、有机联系、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诸生命系统的整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才是维护这个共同体的应有之义^[8]。

六、结语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这个著名论断,还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理论思维的成果不仅形成新思想、新观点,同时还形成新方法、新工具和新的论证手段,这些思想和论证手段又进一步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提供工具和指南,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所在。它对我们认识和理解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而实现“理论掌握群众”以及“群众掌握理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恩格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辛向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3] 张新.读懂恩格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解保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21.
- [7] 王云霞.环境问题的“社会批判”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8] 贺绍芬.“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机制、理论意蕴及其时代价值[J].新疆社科论坛,2022(2):22-27.

(责编:程爱婕)